



当代文化批判丛书  
VVVV 衣俊卿 主编

交往的合理化

与

现代性的重建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深层解读

韩红 著

人民出版社

JIAOWANG DE HELIHUA YU  
XIANDAIXING DE CHONGJIAN

交往的  
合理化  
与  
现代性  
的重建

韩红 著

JIAOWANG DE HELIHUA YU  
XIANDAIXING DE CHONGJIAN

ISBN 7-01-005018-X



9 787010 050188 >

ISBN 7-01-005018-X 定价 20.00元



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学术文库

JIAOWANG DE HELIHUA YU  
XIANDAIXING DE CHONGJIAN

韩红 著

交往的合理化  
与  
现代性的重建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深层解读

人  
民  
出  
版  
社

01

责任编辑:毕于慧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  
深层解读/韩红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

(当代文化批判丛书)

ISBN 7-01-005018-X

I. 交… II. 韩… III. 哈贝马斯 J. 一哲学思想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225 号

## 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

JIAOWANG DE HELIHUA YU XIANDAIXING DE CHONGJIAN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深层解读

韩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018-X 定价: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目 录

导论:现代性的知识图景与思想命运 .....	( 1 )
一、交往行动理论的总体性描述 .....	( 2 )
二、理性困境与现代性危机的倾向 .....	( 8 )
三、与后现代主义的开放式对话 .....	(13)
四、现代性在中国的阐释焦虑 .....	(17)
第 1 章 社会发展与交往的理性审视 .....	(22)
1.1 交往理论的历史演变脉络和思想资源 .....	(22)
1.2 马克思关于交往与交往关系的释义 .....	(30)
1.3 哈贝马斯和马克思关于交往意义域的不同阐释 .....	(42)
1.4 生活世界理论背景的立体透析与学理思考 .....	(49)
第 2 章 交往行为理论的语言哲学维度 .....	(72)
2.1 哲学危机出路的探索——“语言学转向” .....	(72)
2.2 重建现代交往的阿基米德点:普遍语用学 .....	(88)
2.3 现代性理性辩护的中心:话语伦理学 .....	(109)
第 3 章 交往行为理论的社会哲学维度 .....	(120)
3.1 从理性的反思到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	(120)

3.2	现代性道德规范的批判性反思: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139)
3.3	交往行为与生活世界	(148)
3.4	生活世界殖民化与合理化:双层社会解释架构	(162)
第4章	交往行动理论的文化哲学维度	(190)
4.1	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	(190)
4.2	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命运	(210)
第5章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和现代性理论的总体性 思索	(232)
5.1	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方法论分析与思考	(233)
5.2	现代性的交往理论的结构特点及范畴阐释	(246)
5.3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未来向度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 启示	(272)
参考文献		(285)
后记		(300)

## 导论：现代性的知识图景与思想命运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文化批判理论都围绕对现代性问题展开争论。现代性是否存在,是否已过渡到后现代性,现代性理想是否可以实现,是坚持现代性还是彻底否定现代性,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思考。70年代以来,以后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主的反现代思潮企图先弱化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联系,然后把启蒙现代性文化冻结起来,宣称现代性已经死亡,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消失,历史已经进入由经济和社会客观变量相互作用决定的自主进化轨道。这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否定。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不是从批判理论个体主体的传统来探讨现代性,也不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否认和抛弃现代性,他认为传统理性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理性的终结,启蒙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启蒙观念的衰竭,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合理化导致了交往的不合理,把人的关系降格为物的关系,导致全面物化。正是主体间合理的交往可以消解工具理性的自律和异化性质,要扬弃科技的异化,就要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历史理性的关注点从主体—客体结构过渡到主体—主体结构,因此,交往行动理论的提出,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历史理论,哈贝马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

重建或重写现代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对于解答 20 世纪的文化危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20 世纪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批判理论所争论的焦点是现代性问题。支撑和推动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主体性和理性化的文化精神。20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危机恰好是个体性的困境(异化)和理性化(公共性)的危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通过交往的合理化,重建以主体性和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对抗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消解,在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中独树一帜。因此,从重建现代性的高度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做文化哲学的解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一、交往行动理论的总体性描述

德国是一个哲学的王国,近代以来哲学家辈出,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等,数不胜数。20 世纪,德国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界仍处于中心地位,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都是享誉国际的哲学家。但是在当今整个西方思想界以及有关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中,最有创造性和体系性的思想家当属尤尔根·哈贝马斯。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但他不仅仅是简单的沿袭,而是广泛综合当代西方解释学、语言学、实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各派理论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风格,奠定了自己在当代思想理论界令人瞩目的地位。哈贝马斯在理论活动的初期(50—60 年代),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将其理论建设集中于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试图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



度为社会批判理论奠定基础。他在广泛吸收各派,尤其是实用主义、先验现象学和解释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语义学思想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型的认识论即认识兴趣理论,从而在法兰克福学派认识论中独树一帜。然而,到了70年代后期,哈贝马斯认识到这一理论建构是有局限性,批判理论需要更实质的基础。因此,经过反复批判反省自己的研究,最后于80年代完成了从认识论、意识哲学向交往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代表了他学说发展的一个高峰。在这本书里,哈贝马斯提出他的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试图建立一个规范基础去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哈贝马斯用以支持和证明其交往理论的论据相当复杂,牵涉不同学科和层次的分析。在纵贯的层面上,他从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去展现交往行动理论的可能性。他主要采纳的理论包括:韦伯(Max Weber)的西方理性化发展理论,涂尔干(Emile Durkheim)、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以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马克思有关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至于在横贯的层面上,哈贝马斯利用“日常语言学派”(ordinary language approach)的分析方法去建构他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同时也跟随皮亚杰(Jean Piaget)和高贝(Lawrence Kohlberg)的结构发展心理学路向,去进一步说明和证明其所建立的社会研究的规范基础。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澄清了交往理性同现代性的关系,把交往行为理论发展成既包括理性的规范重建,又包括现代社会经验研究的系统理论。语言学转向意味着批判理论从经典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转向对知识和行为合理性基础的积极重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他的

哲学是对旧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哈贝马斯把自柏拉图开始到黑格尔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特点总结为追求同一性、崇尚理性,认为纯粹理论优于实践,而这些特点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又是与他所谓“意识哲学”即主体—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致力于超越“意识哲学”的窠臼,要求人们从专注于抽象概念的旧形而上学世界观,转而注重人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交往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语言哲学维度、社会哲学维度及文化哲学解释模式就是在这样思想指导下产生的。

交往活动理论的基本论题包括两个方面:(1)普遍语用学和交往活动;(2)社会的合理化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从理论上重建交往活动的普遍前提条件,即“对取向于理解的言语行为之普遍规则和必然前提给予理性重建。”<sup>①</sup>哈贝马斯将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看作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其他各种活动(如目的一理性活动或策略活动)都应处于交往活动的支配之下。这种理论综合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塞尔和莱尔(Gilbert Rile)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对这些理论予以重建。交往活动(communicative action)是以理解为目的的活动。哈贝马斯提出,交往活动的发生以“交往性资质”(communicative competences)为前提条件。要达到理解,一个参与交往活动的人必须:a.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b.使自己成为可理解的;c.与他人(听者)达成相互理解或共识(consensus)。为此,一个人必须具有:A.选择陈述语句的能力;B.表示自己意向的能力,以表达自己的意图,使听者相信自己是真诚的;C.实行言

<sup>①</sup> 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 Thomas McCarthy, tr., Beacon Press, Boston, 1984. p. 138.

语行为的能力,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被认可的规范,而说者和听者在这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中达成共识。

如果说普遍语用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语言哲学维度,而关于社会的合理化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论述就是基于交往行动理论的社会哲学思考。从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现代性的合理性在于现代性表现为现代化,而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换言之,人类的文明和历史的进步体现为社会的合理化。哈贝马斯是从韦伯的社会学出发来探讨合理化问题的。在他看来,韦伯的合理化分为三个层次:社会的合理化;文化的合理化;人格的合理化。与韦伯相比,哈贝马斯持一种更强的普遍主义态度。他主张社会的合理化或现代化是一种普遍的历史趋势,并且代表着历史的进步。他赞同韦伯将合理化分为社会合理化、文化合理化和人格合理化三个层面,但是他批评韦伯将现代化仅仅同社会合理化这一个层面等同起来。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可能仅仅体现为社会合理化,然而这只能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是一种片面的进步,只能证明社会合理化与文化合理化没有得到均衡的发展,并因此导致了“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把交往活动同关于“生活世界”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重构一种比韦伯社会学更好的现代化理论。<sup>①</sup>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结构和语言世界的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在关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理解中,语言传统和文化传统具有某种超验的地位。<sup>②</sup> 交往活动的参与者总是在“生活世界”的界域内活动,他们永远不能步出其界域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 Thomas McCarthy, tr., Beacon Press, Boston, 1984, p. 304.

② *Ibid.*, p. 124.

之外。这样，“生活世界”确定了使理解成为可能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交往活动的参与者通过这种共同的“生活世界”来理解和表达存在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sup>①</sup>“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就是所谓的“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人格社会化构成了广义的“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产。与“生活世界”文化再生产相对的物质再生产总体被哈贝马斯称为“系统”。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看，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体系变得越来越合理化，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化。“生活世界”之文化再生产的媒介是语言，而“系统”之物质再生产的媒介是货币和权力。随着历史的发展，“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分化最后变成了两者的脱节，从而导致了哈贝马斯所谓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文化的贫困化”。<sup>②</sup>

为了说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脱节，哈贝马斯引入了“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和“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这两个社会学概念，然后通过部落社会、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比较来说明现代社会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随着“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脱节，“系统整合”的力量便迅速扩张，货币和权力这两种媒介开始取代交往活动成为社会行为的核心。这样，“独立自主的系统从外部侵入生活世界，就像殖民的主义进入部落社会一样”。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病症——“生活世界的殖民化”。<sup>③</sup>

---

①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 Thomas McCarthy, tr., Beacon Press, Boston, 1984, p. 126.

② *Ibid.*, p. 153.

③ *Ibid.*, p. 355.

哈贝马斯将社会分为两大部分：负责文化再生产的“生活世界”和负责物质再生产的“系统”。“生活世界”又可以再分为两个领域，即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系统”也可再分成两个部分，即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行政系统以权力为媒介侵入了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其结果是政治合法性的丧失。因此，要想恢复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必须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重建公共领域，重建生活世界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真正的合理性不是存在于韦伯所谓的“以最优化手段实现既定目标”的目的性行动之中，而是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唯有通过理性交往，人们才能达到对文化的共同界定，形成社会团结和个性人格。从而不断地增强人际交往和团结，满足形成个性人格的需求。

以上就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基本论题作了总体性的简述。从交往行动理论的整个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哈贝马斯心中，理性主义是新时代意识的哲学基础。它不仅体现为文化的合理化，而且是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合理化。文化的合理化保证相应知识领域的合理积累，提高了人们动用相关的文化知识处理外在自然、社会交往和内在自然的社会化等问题的能力。社会合理化表现为，由民法保障的追求自我利益的合理经济活动；宪法保障的公民普遍的政治参与权利；伦理和道德上的自主权，个人追求自己生活理想的自由；在公共领域中通过舆论等公共意志使经济和政治制度接受公众意识监督和制约的权利。因此可以把理性的文化（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和自由的社会结构（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理解为现代性的两个轴心。两者互为条件。理性赋予主体以认知和实践能力，而理性的运用又以自由为社会条件。现代性理论必须运用现代性文化中的理性潜能揭示现代社会实现人类自由的条件。因此，在批判意义上，现代性意识总是表现为社会批判和



文化批判;在建设意义上,总是表现为文化合理性的重建和合理社会的构想。

## 二、理性困境与现代性危机的倾向

综上所述,我们在哈贝马斯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尤其是在《交往行动理论》这本书中能够触摸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理性和现代性的研究。

何谓“现代性”,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大致来说有两种观点:一是把现代性作为断代史意义上的史学概念,论者的主要目的是描述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特征,“现代性”概念是对继古希腊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之后的近现代史的概括性称谓。二是把现代性作为道德理想主义上的哲学概念,论者的主要任务是要探究支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历史变迁背后的规范和理想。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概念无疑属于后者。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既是系统的理论研究,又是对社会科学理论史的解释学批判和文化哲学的解释模式。作为系统的理论研究,他试图通过对人类行为合理性的形式分析,提供一个重新审视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作为社会科学的解释学批判,他想梳理现代性话语的历史发展轨迹,通过对各种现代性理论的批判综合,揭示现代性的真实面貌;作为文化哲学的解释模式通过揭示文化与社会历史运行机制的本质性关联,阐明了现代性的文化内涵。

任何现代性的过程,往往潜在地伴随着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作为内在的支撑力。20世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被一种断裂的文化精神所笼罩。这种文化危机在本质上是西方

理性主义危机：理性主义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给人类带来解放。一方面，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确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把从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理性主义又造成了新的人类生存困境，理性成为贬损人的价值、压抑人的自由的新的异化力量。面对新的人类生存困境，西方哲学界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西方文化的根基——传统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由此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以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为核心的文化批判理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对于回答 20 世纪的文化危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20 世纪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批判理论所争论的焦点是现代性问题。支撑和推动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主体性和理性化的文化精神。20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危机恰好是个体主体性的困境（异化）和理性化（公共性）的危机。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和深刻地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我们有必要从内在逻辑上对西方的现代性的困境和理性的危机及 20 世纪文化反抗的理性表达进行梳理和描述。

对理性的危机和现代性的困境的诊断不是简单的逻辑问题，而是经验现实问题。从黑格尔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批判理论都试图在历史经验中对现代性的合理潜能进行诊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现代性理想同近代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联系起来，把现代化同理性化联系起来，同时又都看到现代性中包含的矛盾和冲突，看到现代性的辩证法，并试图通过对启蒙运动的扬弃来释放理性的潜能，把现代性从误读和片面化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但是，哈贝马斯认为，这一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传统都因为基本哲学范式的错误而失败。

传统现代性理论是在主体意识哲学的语境中运作的。它把理

性理解为人的意识与生俱来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与行为关系是理性的基本框架。理性是主体对客体的表象和干预能力。在这个语境中,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成为真理的源泉。哈贝马斯认为,这一理论范式无法容纳现代性理想,它必然导致理性和自由、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从主客关系出发,认知合理性是对客体的正确表象,行为合理性意味着对客观过程的成功干预。哈贝马斯认为,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不能解释社会行为规范和自我表达的合理性,不能说明道德自我决定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合理性。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通过对其他主体的排斥和对自我本能的压抑来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的统治,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冲突。主体哲学在概念层面的自相矛盾存在两种倾向,一方面,作为理性的主体,人具有不可移易的自由;同时,社会合理化又只能体现为工具和目的的合理性,这种合理化最终必然导致主体的自我奴役。摆脱主体哲学的现代性理论困境,又不抛弃它的批判和乌托邦意向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就特别指出,毁灭了的理性并不是理性,而是膨胀为理性的知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为理性作了充分的辩护。哈贝马斯也认为哲学的危机不是理性的泛滥而是理性的匮乏,他也以重建哲学理性为己任。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和《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也在与人本学直接相关的意义上,对技术理性进行了独特的批判。这种批判是通过揭示生产力发展价值的有限性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困境与社会危机而展开的。这种困境和危机的核心在于工具理性取代了交往理性成为人的生活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关系降格为主客体关系,从而使人陷入到严重的物化。生产力的进

化与发展并不等于就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建立和实现,合理地利用和发挥生产力潜能,虽然能导致经济—工业结构的改进,促进物质财富的提高,但却不能导致制度结构的转变,使人得到自由和解放。哈贝马斯并不认为生产力发展具有根本性的进步意义,一方面他强调生产力的进步并不能给人带来自由,另一方面又突出强调人的“生存”的重要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劳动越来越合理,这造成了生态的破坏,加剧了人的异化和生存困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越来越趋于合理化,主体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核心性问题是工具理性过分强悍,理性化渗透到一切领域中,日益侵入人们进行交往的生活世界中,金钱与权力取代了语言和理解,成为了人们联系的媒介,交往被扭曲,成为伪交往或“无效交往”,这个社会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与动因危机。

合法性危机是指行政控制命令相互矛盾导致直接威胁系统的整合。动因危机是指文化系统被行政行为进行有意识的控制。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危机的唯一原因。”<sup>①</sup>实际上,这就是哈贝马斯不断重申的一个观点的具体体现,即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这造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因危机。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最重要的动机是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前者是指公民自身参与的公共活动领域,这是一个表达意见、反思问题、对话交往的私人领域,而家庭职业私人性是指个人具有的职业成就感和竞争精神。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两种最

---

①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